

域外汉籍研究文丛

东亚文化 比较研究

DONGYA WENHUA BIJIAO YANJIU

王宝平◎主 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域外汉籍研究文丛

东亚文化 比较研究

DONGYA WENHUA BIJIAO YANJIU

王宝平/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文化比较研究 / 王宝平主编. — 重庆 : 西南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6

(域外汉籍研究文丛)

ISBN 978-7-5621-8623-6

I. ①东… II. ①王… III. ①比较文化—文化研究—
东亚—文集 IV. ①G1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1029 号

域外汉籍研究文丛

东亚文化比较研究

王宝平 主编

策划编辑: 黄 璜 徐林平

责任编辑: 杜艳茹

封面设计: 石笑梦

版式设计: 郭清霞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邮政编码 400715

<http://www.xscb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7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1-8623-6

定 价: 65.00 元



《域外汉籍研究文丛》序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了“学术预流”说，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先生的言语是对敦煌文献、殷商甲骨、清宫内阁大库书籍档案等新材料的发现和学问的诞生所做出的总结和判断。这番表述时至今日仍未过时。“域外汉籍”的文献整理与资料研究是最近二三十年来的学界热点，围绕着域外汉籍所展开的学术研究也持续升温，成果层出不穷，可以称之为是21世纪“学术预流”的学科。

一种新学科诞生与学术条件的发展、成熟密不可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物质积累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使得大批中国学者得以走出国门，他们调查、收集海外汉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将大量海外珍稀典籍回传至国内。这与前数十年或数百年零星访书和零星回归的学术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同敦煌学相似，域外汉籍研究是一项涉及中外文化互相交流、具有国际影响的学问。这就是使得域外汉籍研究具有一些明显的特征：

其一是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共同发展。所谓微观研究是指具体某种文献的发掘、研究，具体某一学术问题的解决等等，海外文献分布于日本、韩国、越南以及欧美各地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又分属于各公私图书馆、博物馆、寺庙以及私人藏，情况较为复杂，不一而足，因此，相关文献的寻觅和揭示，都有待于无数微观研究成果的出现；所谓宏观研究则指本学科的理论建构，对域外汉籍的存藏、传播、发掘、整理和研究的规律性的叙述和总结，对域外汉籍的深入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宏观研究的推进，有陈庆浩、张伯伟、葛兆光、王勇、柳斌杰等专家曾作出努力，提出了“整体研究”“比较研究”“从周边看中国”等切



实可行的方法论以及“书籍之路”“汉籍之路”等学术概念，并进一步明确了“域外汉籍”定义的内涵。宏观研究是在微观研究的量的积累的基础上实现的质的科学性总结，微观研究又在宏观研究的指引下卓有效率地开展。二者相辅相成，是学科成熟的一种标志。

其二是中外学界协同合作和研究，包括外国学者对海外汉籍的研究和整理、中外合作进行学术活动等。敦煌学自诞生以来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学术格局，这是因为敦煌文献来源于中国，但随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等人的盗掘而广布于世界，并吸引了各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也由此成为世界性的学问。域外汉籍的情形类似，汉籍源自中国，经商贾贸易、使节往来以及战争掠夺等途径而传播至中国周边，乃至世界各地，也自然诞生了有关域外汉籍研究的学问，同时，汉籍在中国国内有传统文献学的支撑，因此又学者认为应将海内外的汉籍和学问结合起来，由此提出了“国际汉籍文献学”“东亚汉籍研究”的概念，其研究视野得以大为拓展。

过去，海外学者中以日本学者的成就最为可观，比如，长泽规矩也对汉籍的整理，他编纂影印了《和刻本类书集成》《和刻本经书集成》《和刻本汉诗文集成》等一大批影印文献，至今仍为学界所广泛利用；另一方面，大庭修、冈村繁、夫马进等日本学者则对汉籍的研究亦颇为精深，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著述，如夫马进《朝鲜燕行使与通信使》、冈村繁《日本汉文学论考》等。近二三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门的开放，中国学者的成果也越来越多，如安平秋、张伯伟、严绍璁等多位学者数十年来在该领域的浸淫，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善本影印丛刊》《朝鲜汉籍书目丛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等重要成果问世，既有文献的整理影印，也有线索的勾稽描述，更有深度的研究和理论的建构。在中外合作方面，由中国学者参与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汉籍数字化和整理出版已成规模化效应，该馆秉承“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精神，为中外学界提供了大量的珍稀文献，这是中外学者合作整理汉籍的典范。总之，中外学者的共同参与，让域外汉籍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一华夏祖先的古老智慧逐步成为全人类可以共享的知识经典，也让人们认识到汉文化在古代东亚地区背景化的存



在，以及各个古代东亚政权之间的紧密文化联系。

其三，多学科融合研究，表现在学术观点的多角度阐释、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分歧，并在此基础上予以融合贯通，形成共识。域外汉籍学科是一门基于文献的交叉性学科。参与研究的学者来自历史学、文学、宗教学、文献学等不同的传统学科。不同学科往往从不同的角度从事研究，由于研究目的的不同，也往往带来研究方法和研究重心的差异，当然也会带来学术意见的分歧，因此学科之间的融合研究十分必要，这有助于明确域外汉籍研究者的学术分工和合作，也有利于统一对该学科相关问题的认识，并且在选拔和培养年轻学人的时候确立学术标准，使其拥有必要的学术知识储备。

此前，学界对于“域外汉籍”的概念尚有不少分歧。2013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举办了“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4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的学者齐聚山城重庆，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先生称之为“里程碑式的会议”，由此确定了域外汉籍的内涵和外延。人们认识到，域外汉籍包含着三个层次或三个类别。第一个层次，即中国人用汉字写的书流传到国外。第二个层次，即外国人根据中国古籍刻的书，比如和刻本、安南刻本、高丽刻本等。第三个层次，即外国人用汉字写的书在外国刻印的，如《韩国文集丛刊》所收录的韩国人的汉文文集，以及“燕行录”文献等。过去，我们认为域外汉籍是中国传世文献的补充，但域外汉籍数目庞大，种类多样，特点突出，与中国境内的汉籍息息相关，是巨大的文化宝库，是根与树冠的关系，让汉籍变成为东亚人民共同的精神源泉和知识海洋，显然这足可以支撑起一门新的学科。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目前，域外汉籍的整理和研究正方兴未艾，有关域外汉籍的学术成果越来越多，有关域外汉籍的学科建设正逐步走向成熟，仅就国内而言，多所院校即成立有域外汉籍相关的学术研究机构，如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四川大学东亚汉籍研究所、武汉大学域外汉学与汉籍研究中心等等。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又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参与到这片广阔的新兴学术天地当中，预示着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充满着生机，也预示着将出现更多的学术突破。

当然，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艰辛共生。唯愿与诸君同济风雨同舟，甘苦共济，携手奋进，描绘出一幅东亚汉文化圈生动的历史图景。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了编纂一套“域外汉籍研究文丛”的计划，本计划萌发于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编纂出版工作中，在十多年的海外珍稀文献调查、遴选、收集、编辑、出版的进程中，我们深感基础工作与学术研究相互转化的重要性。由此，我们希冀这套丛书，能够及时揭示域外汉籍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期待能为未来的域外汉籍整理提供新的学术方向，更希冀有识之士共襄盛举。是为序。

孫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序

王晓平

西湖成为东亚风光美的象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早在 14 世纪，由“潇湘八景”“西湖八景”为代表的“八景”，就以一种文化概念的形式被朝鲜人接受，随后到 16 世纪，这种概念也在日本定型扎根。“西湖八景”和“潇湘八景”一起，形成了一种以汉语四字分别概括八种最具特色的地方名胜的模式，以作为一个地区的文化名片广泛传播，这种模式既有对自然风物的审美情感，也有对汉语魅力的执着。日韩数不清的咏唱本土、本地“八景”的汉诗，都在模仿西湖八景的诗句中力图旧曲新唱，翻出异声，而日本江户时代描绘美景的图画，竟然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八景物”的独特画类。最有名的莫过于歌川广众的《江户八景》，其他如《武阳金泽八景图》等，不胜枚举。在日本，最早咏本地“八景”的诗是汉诗集《钝铁集》中的“博多八景”，而今天有“八景”之称的地方竟然达到 400 多处；在朝鲜，历史上最著名的也有朝鲜八景、平壤八景、朝鲜关东八景、朝鲜关西八景、丹阳八景、丹阳第一八景等说法。在当下，为推进旅游业而举行的评选“八景”的民间活动，自然带有明显的汉文化特色。这些都让我们想到杭州在东亚文化与文学交流中许多独有的话题。

1

中日韩许多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熟悉杭州，常游西湖，还因为这里有一个浙江工商大学，大学里有一个日本语言文化学院，还有一个东亚研究院，有一批埋头于国际间文化交流研究的学人。透过王宝平主编的《东亚文化比较研究》，可以看到他们活跃在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上的身影。

2014 年 10 月，来自中日韩三国的学者聚集在工商大学，围绕东亚古典文学交流的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对话。

这次会议，是东亚比较文化会议举行的第 12 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本会议走过的历程。1996 年，在日本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西进的倡导下，中日韩三国一些研究文化的学者，在日本帝塚



山学院大学召开了第一届东亚比较文化会议。这个会议，以各自的民族语言作为工作语言，三国学者轮流担任会长，在三国轮流举办，以平等对话为宗旨，聚焦于如何继承文化传统、构建新文化的各种课题。前7次会议，即从1996至2002年均为每年举办一届，分别在日本帝塚山学院大学、日本熊本大学、中国北京大学、韩国东国大学、日本国学院大学、中国南开大学、韩国中央大学召开。三国成立的分会，举行了多种多样的学术交流活动，出版相关书籍，日本分会还编辑出版了会刊。

从第8届开始，研讨会隔年举行。历届会议以对文化展开国际性、跨学科研究为特色，议题十分广泛，哲学、思想、宗教、历史、语言各种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第8届以来其研讨的议题如下：

第8届（2004年10月9日至10日，日本九州产业大学）《东亚的祖灵观》

第9届（2006年9月9日至10日，中国复旦大学）《东亚文化的继承与扬弃——东亚共同体文化基盘形成之探讨》

第10届（2008年10月25日至26日，韩国高丽大学）《东亚人文传统与文化力学》

第11届（2010年10月23日至25日，日本万叶文化馆）《东亚世界新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围绕中日韩文化里的普遍性与固有性》

第12届（2014年10月25日至26日，中国浙江工商大学）《东亚文化交流——以古典文学为中心》

东亚比较文化会议从发轫到2016年，恰好是20个年头。这20年间，三国的社会思潮、文化思潮和学术思潮在激烈变化，文化交流也不断出现新景观，学术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影响也时隐时现。那么，为什么还有一些学者能远离嚣尘，坐在一起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对话呢？说来这个会议的基本成员，是各大学从事古代文化和文学教学的教师，而对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又具有相当的兴趣。他们的研究对象中，有很多中国元素。虽然这些年在三个国家，“国学”那些事在多数场合越说越热闹，但总有很多人希望知道自己的文化在别的文化中实际上呈现出的是一种什么状态，把认识自身文化与他者文化当成相互关联的事情，也总想从多元文化中吸取更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力量。在现代学科





体系中，大墙小墙，大篱笆小篱笆，都是随处可见的，这就自然会出现些不甘心总呆在墙内篱笆内的人，愿意出门去走一走、看一看。东亚比较文化会议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平台，一个以平等的学术对话为理想的平台。平等是一种价值，也是一种追求；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实力的对撞；是不会有任何人赐予的免费午餐，而恰好是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晶。平等的学术对话还需要语言、学术基础和沟通能力方面的条件。自说自话或话而无果的场面也是常见的，但这并不是中止对话的理由。

除了发表论文之外，比较文化会议还开展了多种文化交流活动，让与会者切实感受三国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当我们在韩国佛寺观赏鼓乐，在日本国学院听学生演奏尺八的时候，我们对自身文化在邻国的演化不是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吗？这其实也是一种对话，是非语言的对话。同样，日韩两国学者也曾在北京大学、天津古文化街、上海豫园和杭州西湖畔，寻找和验证他们平时在异国阅读中国诗文时获得的印象。严绍璁、王晓平、胡令远、王宝平曾先后担任会议的会长，我国学者在这种交流活动中表现出的主动、热情、大度与富有主见的风范，也获得了各国学人的一致好评。第6届会后，《变动期的东亚社会与文化》论文集2002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举办的那次会议，多种媒体予以报道，在学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3

不论从人员构成，还是学界关注度来看，汉字文化圈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都似乎不能与“中西比较文学”“中西比较文化”旗下的阵势相比，学术积累看上去似乎也不那么起眼。很多东亚学者感兴趣的历史文化问题，需要有一个面对面接触直接对话的场合。对于相近或相关的问题，三国学者是在不同的学术体系中进行着各自的探讨，而面对面的接触，则为沟通学术语言、交换研究信息、缩小误读尺度提供了机会和选择，对于近距离了解对方的学风、学术方法和未来走向，都是有益的。

汉字曾是东亚文化的核心，是历史上东亚文化圈最重要的传播工具。这对于今天的东亚文化交流也非常重要，因为汉字思维早已深入到三国文化的体肤乃至血管之中。不仅儒道佛的传播与接受不能离开汉字去理解，就是上面提到的各国“八景”，也无不以充满诗情画意的四个



汉字来展现,如从朝鲜李朝一直相传至今的所谓平壤八景,即乙密赏春、浮碧玩月、永明寻僧、普通送客、车门泛舟、莲塘听雨、龙山晚翠、马滩春涨,这种表达方式本身是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果,而用朝鲜文字的呈现则是这种交融的另一种形式。三国文化交流因为历史上各自复杂而密切的联系,又有汉字因素的影响,结果就出现许多有意思的现象,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大不相同,这些都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

在中日韩文化体系中,文学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文学也是最有活力和最经常的角色。在未来新文化的建设中,我们不应轻易忘却那些共有的文学遗产,其中特别值得珍视的是汉文学遗产。在描写西湖美景的诗句中,苏轼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日本梵语学者南条文雄(1849—1927)有“一时忠节岳王坟,千古风流苏轼祠”(《西湖》),把这些诗篇放在一起欣赏,对比分析,是可以发现其中异同的。编一本三国诗人咏西湖的诗集,是有丰富材料的。浙江工商大学的学者们汉文化研究的成果很值得称道。知同、明异、互读、共赏,在对话中寻求破解相互理解的难题,学术交流或者不能立竿见影,却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为国际学术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些历来深藏篋底的历史文献,可以以最接近原貌的形态,让身在世界任何角落的读者,轻轻一点便清晰地读到,仿佛面对原件;而那些最新鲜的思想和表述,也可以迅速传递到最遥远地方的学者手中。然而,学人的目光对目光的交往、来言对去语的交谈仍有其独有的魅力。作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同时也会是他者故事的倾听者,因为熟悉了对方的文化和接受心理,我们的故事才能讲得更精彩,更入心。近年来,我国的文字学家越来越多地关注汉字在周边各国的传播和演变,古典文化研究者也将“周边看中国”列入研究课题。东亚汉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几十年来,已由浪花汇成溪流,正在由溪流汇成江河。《琉球汉文文献集成》《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日本汉诗文总集》《韩国诗话全编校注》《日藏诗经古写本刻本汇编》等卷帙浩繁的大型丛刊的问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国际汉学研究通讯》《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表的大量高质量论文,都为“国学”也为与之相对的



“外学”即外国文化之学提供了很多新材料。而“东亚汉文小说整理与研究”“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日本五山文学别集校注与研究”“东亚笔谈文献整理与研究”“中朝三千年诗歌交流系年”以及相关重大课题的展开，都说明我国对周边文化的研究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我国学者正在利用自身的学术优势，积极面对域外文化研究的新课题。“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以扎实的文献研究为基础，打通各学科的汉文化和汉文学研究的春天，正一步一步向我们慢慢走来。

书有时比人走得远，也比人命长，当然也会有书还没有问世就已经死了，那些说假话、谎话、废话的书或许应该纳入此列。王宝平主编的这本书，是有益于文化互通互鉴的，愿它能走得远，走得长，也盼望从美丽的西湖边飞来更多汉文化研究的好文、美文。

目 录

《域外汉籍研究文丛》序言·····	孙晓 (1)
序·····	王晓平 (1)

东亚文化篇

ASUKA 考·····	中西进 (3)
长屋王传和东亚文化交流·····	辰巳正明 (10)
东亚汉文小说的汉字学研究·····	王晓平 (21)
十二生肖文化与民间信俗·····	李凇旭 (35)
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的断句和管到——论日中韩的 汉文学传统及特性·····	古田岛洋介 (51)

中日文化篇

白居易诗和菅原道真诗——关于湖泊诗·····	波户冈旭 (59)
互相关联的主题——以《大云寺缘起》所载成寻的 日本奇瑞为中心·····	水口干记 (70)
“郊祀”仪礼与东亚世界——遣唐使的派遣·····	山田直巳 (96)
雪月花与宴席歌——《万叶集》的季节感与 中国文学·····	铃木道代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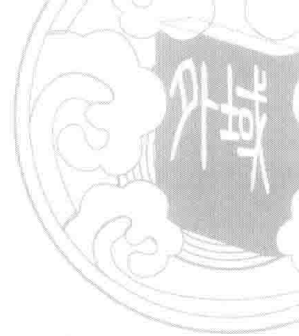
- 从“金乌”和“泉路”看大津皇子的临终诗……………大谷步(124)
- 论菅原道真汉诗文中的“浮云”……………于永梅、张晓晔、李欢(141)
- 日本汉诗人北条鸥所与晚清上海文人交游考论……………高平(153)
- “服部孔子教”再考——其原点和对中意识……………丹羽香(169)

中韩文化篇

- 论中国小说东传与朝鲜早期小说观念之揭橥……………赵维国(181)
- 《红楼梦》和《镜花缘》的俗语翻译技法考察……………高明珠(202)
- 韩国文学中对“渔父”的接受、理解和发展变化
——以屈原和庄子作品中的渔父为中心……………朴美子(221)
- 从寓意角度解读中韩公案小说中的动物形象……………吴晓丽(246)
- 对中韩古代小说中性欲望的考察——以《金瓶梅》
和《折花奇谈》为主……………卢仙娥(268)

- 后记……………王宝平(283)

东亚文化篇



ASUKA考

中西进*

一、何为“アスカ”

六世纪末七世纪初，日本基本实现国家统一，并建造了类似首都的建筑。

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中，最早的和歌也出自这一期间。这些和歌所咏的内容发生在一个名为“ASUKA(アスカ)”的地方。众所周知，这就是现在的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

这个被称为“ASUKA”的重地，其名字到底有什么含义？

令人惋惜的是，这个地方虽然极为重要，但地名的含义却尚不明确。先来探讨地名的含义。

地名的表记有以下几种：

阿须箇（《日本书纪》齐明四年五月）

阿须可、安须可（《万叶集》卷十四）

阿须迦（《船首王后墓志》）

随带一提，船王后埋葬于 668 年。

以上均是“ASUKA”的音译。然而将本文要探讨的地方训读为“ASUKA”，这本身又是否妥当呢？

因为，在《日本古代人名词典》中，载有“安宿”“安直”“安敕”等姓氏，这些姓氏被认为与这个地方存在一定的关系。可见，该地除了训读作“ASUKA”，还可以训读为“ASUKU(アスク)”，读法并不统一。

那么要如何理解“ASUKA（以及 ASUKU）”这个词源不明的词呢？关于这个词的词源，目前尚未有统一的说法。

* 日本京都市立艺术大学名誉教授。